

##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及其制约因素

王 晋

摘 要：“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是该组织海外扩张的典型案列。在利比亚政局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伊斯兰国”组织试图在利比亚复制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扩张和管理模式。然而，“伊斯兰国”组织外籍极端分子同利比亚当地部落之间的矛盾，以及该组织在利比亚有限的物力和财力，成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扩张受挫的重要原因。宗教极端主义既是“伊斯兰国”组织扩张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其扩张的制约因素。

关 键 词：利比亚 “伊斯兰国”组织；恐怖主义；北非

作者简介：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生。

文章编号：1673-5161(2016)03-0090-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6月，极端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宣布更名为“伊斯兰国”，且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此后，“伊斯兰国”组织进入了全球扩张的新阶段。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是该极端组织“建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4年以来发展迅猛。当前，“伊斯兰国”组织利比亚分支的成员数量在1 000~3 000人之间，该分支势力范围包括利比亚中部重镇苏尔特和东部城市德尔纳，并且在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南部费赞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是该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和西奈半岛之外最大的分支。“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已对北非地区的反恐形势构成严峻挑战，“利比亚人民及该国周边更广泛的区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的危险”<sup>①</sup>。

国内学界关于“伊斯兰国”组织的研究侧重考察“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外部因

<sup>①</sup> 《特别代表：利比亚面临来自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分子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联合国新闻网，<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3485>，登录时间：2015年7月12日。

素及其形成的地区性影响。<sup>①</sup> 西方学界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析较为多元,有的学者关注“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发展和扩张状况;<sup>②</sup>有的学者关注“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对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挑战;<sup>③</sup>有的学者关注“伊斯兰国”组织的社交网络宣传策略、动员模式和招募手段,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sup>④</sup>有的学者关注“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后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变化,及其对西方世界构成的威胁和挑战;<sup>⑤</sup>有的学者关注“伊斯兰国”组织内部结构、运作模式及其对控制区域的管理;<sup>⑥</sup>有的学者关注“伊斯兰国”组织外籍武装人

<sup>①</sup> 国内相关成果可参见王雷《“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载《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第1-14页;严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7期,第23-27页;董漫远:《“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51-61页;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第24-30页;孙冉、唐恬波《“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特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第56-59页;龚正《“伊斯兰国”冲击美国中东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第61-64页;李绍先《“伊斯兰国”因何而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第55-56页;周鑫宇、石江《“伊斯兰国”最新发展趋势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第41-47页。关于“伊斯兰国”组织的演变历程和内部结构,可参见曾向红、陈亚洲《“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第103-122页;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138-156页。

<sup>②</sup> 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包括: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的查里斯·李斯特(Charles Lister)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亚伦·泽林(Aaron Y. Zelin),其研究关注“伊斯兰国”组织扩张、演变及最新进展。

<sup>③</sup> 参见 Fallujah Redux, *The Anbar Awakening and the Struggle with Al-Qaeda*,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Rajan Julie, *Al Qaeda's Global Crisis: The Islamic State, Takfir, and the Genocide of Muslims*,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Jessica Stern, *ISIS: The State of Terro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5。

<sup>④</sup> James Farwell, “The Media Strategy of ISIS,” *Survival*, Vol. 56, No. 4, 2014, pp. 49-55; Ali Fisher, “Swarmcast: How Jihadist Networks Maintain a Persistent Online Presenc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9, No. 3, June 2015, pp. 3-20; Abdel Bari Atwan, *Islamic State: The Digital Caliphate*, London: Saqi Books, 2015。

<sup>⑤</sup> Alvi Hayat, “The Diffusion of Intra-Islamic Violence and Terrorism: The Impact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Salafi/Wahhabi Ideologies,”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2, 2014, pp. 38-50; Eric Anderson, “Confusing a ‘Revolution’ with ‘Terrorism’,” *Small Wars Journal*, Vol. 1, No. 3, June 2015, pp. 40-43; Gary Anderson, “Abu Bakr al-Baghdadi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ihad,” *Small Wars Journal*, Vol. 8, No. 2, August 2014, pp. 12-18; Anthony Celso, “Zarqawi: Al-Qaeda’s Tragic Antihero and the Destructive Role of the Iraqi Jihad,” in Anthony Celso ed., *Al-Qaeda’s Post-9/11 Devolution: The Failed Jihadist Struggle against the Near and Far Enemy*,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p. 105-128。

<sup>⑥</sup> Malcolm Nance, *The Terrorists of Iraq: Inside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the Iraq Insurgency 2003-2014*, Boca Raton: CRC Press, 2015; 以色列青年学者艾曼·贾瓦德·塔米米(Aymenn Jawad al-Tamimi)在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发表过关于“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教育和民政事务的系列文章,参见 <http://www.meforum.org/author/Aymenn+Jawad+Al-Tamimi>。

员的情况;①还有学者对“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后的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保护问题进行探讨。②西方学界对于“伊斯兰国”组织的研究较为全面和细致,但对于“伊斯兰国”组织海外扩张动因、路径和趋势的论述仍显不足。

国内外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研究分析总量较多,且视角多元,这些研究大多认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扩张和发展呈现几大特征。首先,“伊斯兰国”组织源起于地区秩序的混乱。“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地区大多经历政局动荡,各种政治力量对抗激烈,部分国家的“无政府状态”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其次,“伊斯兰国”组织成员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和全球性特征。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并招募极端分子加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圣战”运动,以充实自身的军事政治力量。最后,“伊斯兰国”组织初期的发展呈现本土化特征。与“基地”组织热衷于袭击西方目标不同,“伊斯兰国”组织更重视巩固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试图通过各类专业的民政机构贯彻宗教极端意识形态,积极煽动当地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矛盾,并以此作为获取当地民众支持的重要动员手段,同时通过征收赋税、倒卖石油等各种方式获取资金。

本文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是该组织海外扩张的典型实例,考察“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发展脉络有助于分析“伊斯兰国”组织海外扩张的路径、手段和影响。本文主要考察“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情况,具体分三个部分论述: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源起、发展和扩张过程;第二部分考察“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扩张的特点和手段;第三部分分析“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扩张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因素。通过阐述“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海外的扩张试图复制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发展模式,但它同时也面临着作为外来组织如何在利比亚实现“本土化”的困境,也预示着“伊斯兰国”组织在未来的海外扩张会进行某些调整,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警惕。

① Basit Abdul, “Foreign Fighters in Iraq and Syria — Why So Many?”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is*, Vol. 6, Issue 9, October 2014, pp. 4–8, <http://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4/07/CTTA-October14.pdf>, 登录时间:2015年8月19日; Azzam Chantal, “Australian Foreign Fighters: The Long Reach of the Syrian Conflict,”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is*, Vol. 6, Issue 9, October 2014, pp. 9–13, <http://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4/07/CTTA-October14.pdf>, 登录时间:2015年8月19日; Daymon Chelsea, “From the Guy Next Door to the Fighter Overseas: A Look at Four Foreign Fighters Who Joined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Small Wars Journal*, Vol. 8, August 2014, pp. 27–35。

② Ahram Ariel,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ISIS,” *Survival*, Vol. 57, No. 3, 2015, pp. 57–78; Bradford Alexandra, “Western Women Who Join the Islamic State,” *Terrorism Monitor*, Vol. 13, No. 9, June 2015, pp. 3–5。

## 一、“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源起和扩张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发展可追溯至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当时, 部分利比亚籍极端分子潜入叙利亚参加反政府武装活动。2012 年初, 在叙利亚作战的利比亚籍极端分子宣布组建“巴塔尔旅”(Battar Bridge), 声称要在叙利亚发动针对什叶派的“圣战”。“巴塔尔旅”在声明中特别提到了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Derna), 并感谢德尔纳民众对“巴塔尔旅”和其他在叙利亚参战的利比亚武装人员的支持, 表明德尔纳当地的极端组织和海外极端组织存在着密切联系。2014 年初, “巴塔尔旅”部分成员回流至利比亚, 在德尔纳组建“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Islamic Youth Shura Council, IYSC)。同年 9 月, “伊斯兰国”组织派出“代表团”赴利比亚德尔纳, 受到“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的欢迎。10 月, “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 并宣布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地区成为“伊斯兰国”的“拜尔加省”(Wilayat Barqa)。此后不久, “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宣布利比亚并入该组织的“建国版图”, 并将利比亚划分为三个行省, 即东部的“拜尔加省”、西部的“塔拉布鲁斯省”(Wilayat Tarabulus)<sup>①</sup>和南部的“费赞省”(Wilayat Fezzan)<sup>②</sup>。当前,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德尔纳、班加西、苏尔特、黎波里以及利比亚南部的一些地区。费赞地区尽管被宣布并入“伊斯兰国”组织, 但该组织武装势力在当地的的活动较少, 仅在南部的苏克那(Soukna)等地针对当地的军事目标发动过几次规模不大的袭扰活动。

利比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崛起于东部城市德尔纳绝非偶然, 历史上德尔纳是利比亚和北非地区重要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策源地,<sup>③</sup>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数十名德尔纳地区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对苏联的“圣战”。“9·11”事件后, 德尔纳的极端分子积极加入海外恐怖主义网络和极端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2007 年, 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伊拉克境内有一批来自德尔纳的极端分子异常活跃。2011 年“阿拉伯之春”波及至利比亚后, 德尔纳的武装势力是利比亚境内最早反抗卡扎菲政权的反政府武装之一。2012 年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也同德尔纳的极端分子有关。2011 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 德尔纳当地兴起了多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 除上述“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外, 较有影响力的极端组织还包括“阿布·赛利姆烈士旅”组

① 利比亚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

② 利比亚南部费赞地区。

③ 关于德尔纳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渊源, 可以参见 Alice Fordham, “Derna, the Sleepy Town of Islamist Extremism,” *The National*, September 22, 2012, <http://www.thenational.ae/news/world/middle-east/derna-the-sleepy-town-of-islamist-extremism>, 登录时间: 2015 年 7 月 29 日。

织( Abu Salim Martyrs Brigade) 和“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 Ansar al-Sharia) ①等。从 2011 年开始,“德尔纳成为一个混乱之地,这里没有警察,没有秩序,有的只是不同武装派别之间建立的脆弱平衡”②。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受到了来自其他极端组织的挑战。在德尔纳,“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武装长期同“阿布·赛利姆烈士旅”关系紧张。“阿布·赛利姆烈士旅”由赛利姆·德尔比( Salim Derbi) 领导,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AQIM) 关系密切。2014 年 5 月以来,“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同“阿布·赛利姆烈士旅”的关系日趋恶化,相互间的仇杀行为时有发生。同年 10 月,德尔纳当地“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并建立“拜尔加省”后不久,“阿布·赛利姆烈士旅”宣布不承认“拜尔加省”的合法性,并表示该组织绝不加入利比亚境外的任何团体。2014 年下半年开始,“阿布·赛利姆烈士旅”和“伊斯兰国”组织在德尔纳城内彼此开展报复行动。同年 12 月,“阿布·赛利姆烈士旅”和德尔纳地区其他几个武装团体宣布组建“德尔纳圣战士协商委员会”( Majlis Shura al-Mujahidin Derna),一方面对抗来自于哈夫塔尔所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 Libyan National Army) 的进攻,另一方面在德尔纳地区努力遏制日益扩张的“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势力。

此外,“伊斯兰国”组织在德尔纳推行的一系列极端政策也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并最终导致“伊斯兰国”组织势力被逐出德尔纳。2015 年 4 月,“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在德尔纳对一名当地居民公开实行“斩首”,理由是此人的家庭没有按照“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的要求缴纳 30 万利比亚第纳尔( 约合 20 万美元) 的保护费。德尔纳的奥贝达( al-Obeidat) 部落首领因对“伊斯兰国”组织在当地的表示不满,经常发表反“伊斯兰国”组织的言论,其住所遭到该组织的报复性袭击。此次事件直接导致德尔纳的奥贝达部落“起兵反抗”,武装民兵同“伊斯兰国”组织在德尔纳全城展开交战。2015 年 6 月,“德尔纳圣战士协商委员会”头目纳西尔( Nasir Atiyah al-Akar) 遭到暗杀,公众普遍认为凶手是“伊斯兰国”组织德尔纳分支的武装人员。此事件导致“德尔纳圣战士协商委员会”和“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之间产生严重对立,德尔纳民众也纷纷拿起武器反抗“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6 月中旬,“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最终被德尔纳的民兵武装逐出城区。

① 突尼斯和利比亚班加西地区也存在“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但与德尔纳地区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并无直接联系。参见美国国务院对于三者关系的简述“Terrorist Designations of Three Ansar al-Shari'a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0, 2015,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01/219519.htm>, 登录时间:2015 年 9 月 1 日。

② Aaron Y. Zel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sar al-Sharia in Libya,” *Hudson Institute*, April 6, 2015, <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1197-the-rise-and-decline-of-ansar-al-sharia-in-libya>, 登录时间:2015 年 10 月 5 日。

利比亚中部海滨城市苏尔特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伊斯兰国”组织同苏尔特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13年6月,当时“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组织的前身)负责宗教事务的头目图尔基·比纳利(Turki al-Binali)曾赴苏尔特进行宣讲,号召当地民众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随着2014年“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在德尔纳建立政权,“伊斯兰国”组织也加紧在苏尔特活动。苏尔特当地的武装团体“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sup>①</sup>在2015年1月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同年2月,“伊斯兰国”组织大批武装人员由德尔纳向苏尔特挺进,并且同苏尔特“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一道入驻苏尔特城。此后,“伊斯兰国”组织在苏尔特城内一边扩大势力范围,一边驱逐城内其他武装派别。至该年6月,“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势已实现对整个苏尔特城区的控制。

“伊斯兰国”组织在苏尔特的扩张受到了来自城内其他武装派别和当地居民的挑战。2015年2月,“伊斯兰国”组织进入苏尔特城后,任命当地人乌萨马·卡拉马(Usamah Karamah)担任苏尔特城的行政长官。乌萨马的亲属曾担任过卡扎菲政府的情报高官,因而该任命决定遭到了苏尔特城内部分米苏拉塔籍武装人员的反对。驻防当地的米苏拉塔武装人员同“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展开交战,但很快遭到镇压。同年8月,苏尔特萨拉菲派领袖哈立德·法尔加尼(Khaled Ben Rajab al-Ferjani)遭到暗杀。哈立德生前多次发表反“伊斯兰国”组织的言论,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暗杀事件是当地的“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所为。此事件激起了哈立德所属的部落民众、萨拉菲派和其他武装团体的激烈反抗,苏尔特当地民众同“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sup>②</sup>但“伊斯兰国”组织武装迅速集结苏尔特和东南部瑙费利耶(al-Nawfaliyah)镇的部队,向苏尔特发动猛攻,杀害了当地百余名军民,并重新占据苏尔特。

当前“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除了控制苏尔特及其东南部的瑙费利耶镇和周边地区外,还在利比亚东部班加西、艾季达比亚(Ajdabiya)和德尔纳,西部的萨布拉塔(Sabratha)和的黎波里频繁活动,但该组织在这些地区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在德尔纳和班加西,“伊斯兰国”组织在同当地的武装团体“班加西革命者协商委员会”(Majlis Shura Thuwar Benghazi)和“德尔纳圣战士协商委员会”的竞争处于下风,只能占据城外零星的据点;在艾季达比亚和萨布拉塔等地,“伊斯兰国”组织分别同当地的“利比亚国民军”和“利比亚之盾联盟”(Libya Shield Alliance)争夺主导权;在

<sup>①</sup> 苏尔特“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虽与班加西和德尔纳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同名,但互相之间不存在关联。

<sup>②</sup> 鲁珀特·科尔维尔《关于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的新闻简报说明》(2015年8月18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http://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6329&LangID=C>, 登录时间:2015年9月1日。

的黎波里和南部费赞等地,只有少量的“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发起零星的武装袭击。可以说,当前“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形成了以苏尔特为中心,辐射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组织网络。

## 二、“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扩张的特点

“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扩张遵循特定的路径,并呈现以下特征:首先,“伊斯兰国”组织在地区国家的政局动荡中借势而起。一般认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依赖三大因素:一是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破坏了中东传统地缘政治格局,在地区国家造成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2003 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长期秉持世俗主义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中央政府不复存在,为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在伊拉克境内暗流涌动提供了契机。二是美国基于国力衰退和战略调整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奥巴马政府调整中东反恐和安全政策,无暇顾及“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壮大。三是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在中东开展权力竞争和博弈,使得国际社会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上难以达成共识和形成合力。

其次,“伊斯兰国”组织在发展壮大时,以依靠当地的极端分子和极端团体为主,辅之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外籍武装人员。有学者将外籍极端组织武装人员定义为“在一国内战期间加入极端组织的非战争所在国国籍人员”<sup>①</sup>。也有学者对外籍极端组织武装人员设定了四个判定标准,即加入某个极端组织或者参与该组织的活动;不具有冲突国国籍或者与该国有各方并无亲缘关系;不隶属于任何一个交战国境内的正式团体;自筹资金参加交战。<sup>②</sup>“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扩张,主要借助于伊拉克萨达姆时期的军队和社会网络的力量,而外籍极端分子则更多地被委以一线作战任务。<sup>③</sup>从“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实际行动来看,外籍极端分子往往处在冲锋陷阵的第一线,而伊拉克和叙利亚当地的武装分子则在战争进入白热化之后才投入战斗。相关报告也指出,“积极投入第一波冲锋的人员大多是来自中亚的武装人员”,而伊拉克政府军在总结迪亚拉省形势的报告中也指出,“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外籍极端分子冲锋在前,随后才是阿拉伯

<sup>①</sup> David Malet, “Why Foreign Fighter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Solutions,” *Orbis*, Vol. 54, No. 1, Winter 2010, pp. 97-114.

<sup>②</sup> Thomas Hegghammer, “The Rise of Muslim Foreign Fighters: Isla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Jiha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3, 2011, pp. 53-94.

<sup>③</sup> 参见 Truls H. Tønnessen, “Heirs of Zarqawi or Sadda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Qaida in Iraq and the Islamic Stat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9, No. 4, 2015, pp. 32-48, 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伊斯兰国”组织高层的国籍和履历,认为这些高层同伊拉克境内的政治力量关系密切。

极端分子前来打扫战场”。<sup>①</sup>

最后,“伊斯兰国”组织在扩张区极力煽动教派矛盾,并在占领区内完善社会网络,通过各种手段攫取当地的财富,做到“以战养战”。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善于煽动宗教仇恨和教派矛盾以提升自身影响力,并严格执行所谓的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国”组织在对外宣传上往往利用“什叶派—逊尼派”矛盾令自己的扩张行动合法化,这种扩张策略早在扎卡维时期便是“伊拉克伊斯兰国”惯用的手段。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大规模扩张,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多次公开号召其支持者对“异教徒”发动“圣战”,提出“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和平的宗教,而是战斗的宗教。所有人都不应认为我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仅仅是伊斯兰国的战争。这是所有穆斯林的战争,而伊斯兰国则是它的先锋。这是全体穆斯林对异教徒的战争”。<sup>②</sup>“伊斯兰国”组织在占领一个地区后,往往会宣布设立伊斯兰法庭,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传统处理各类民政事务,禁酒禁烟禁毒,打击各类其宣称的“违法行为”,要求妇女佩戴面纱,并破坏当地非伊斯兰文化遗产等“异教徒遗迹”。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往往通过完备的行政机构,建立在占领区的统治力量,汲取社会财富。2014年8月,“伊斯兰国”组织仅通过敲诈、威胁和绑架等方式便获得1 200万美元的收入。由于“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大部分地区石油资源丰富,该组织通过石油走私等手段获得的收益每月可达3 000万至9 000万美元不等,走私的目的地主要是土耳其、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区、叙利亚南部、黎巴嫩以及约旦等国家和地区。“伊斯兰国”组织在占领区收取税金,除穆斯林正常缴纳的“什一税”外,该组织还向非穆斯林收取“保护税”。此外,“伊斯兰国”组织在占领区偷盗和搜集各类古董进行倒卖,设立高速路卡以收取各类“过桥费”、“高速费”,并向过往司机颁发“伊斯兰国”组织交通部门发行的通行证。<sup>③</sup>这些搜刮而来的资金部分用于支付“伊斯兰国”组织内部人员和战士的薪水,部分用于宣传和购买武器,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电力和供水系统、建立学校和救济穷人,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手段以巩固占领区的统治。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行动同样也呈现出上述特点。首先,利比亚国内战乱频仍,各方势力关系错综复杂,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渗透与扩张提供了机遇。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该国陷入严重的安全危机,国内安全问题与国家重建相

<sup>①</sup> Eli Lake, “Foreign Recruits are Islamic State’s Cannon Fodder,” *Jakarta Globe*, February 3, 2015, <http://jakartaglobe.beritasatu.com/opinion/commentary-foreign-recruits-islamic-states-cannon-fodder/>, 登录时间: 2015年7月1日。

<sup>②</sup> “Islamic State Releases ‘al-Baghdadi Message’,” BBC, May 14,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274407>, 登录时间: 2016年1月3日。

<sup>③</sup> Charles Lister, “Profiling the Islamic State,” *Brookings Doha Center Analysis Paper*, No. 13, November 2014.



互掣肘,致使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国家重建停滞不前。利比亚安全问题中的部落因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相互交织,溢出效应凸显,对利比亚政治重建构成严峻挑战,对邻国和北非地区的安全局势亦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当前,利比亚在政治上分裂成以黎波里为首都的“国民议会”(General National Congress)和图卜鲁格为临时首都的“国民代表大会”(Majlis al-Nuwaab)的两大势力范围,在军事上则分成以东部武装力量为主的“尊严运动”和西部武装力量为主的“黎明运动”的两大阵营。在国际层面,埃及和阿联酋倾向于支持图卜鲁格政府,而卡塔尔和土耳其则支持的黎波里政府。

其次,外籍极端分子成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扩张的重要依靠力量。“伊斯兰国”组织同时依靠本土与境外极端分子和组织实现在利比亚的扩张。无论是 2012 年在叙利亚活动的“巴塔尔旅”,还是 2014 年创立的“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均是由利比亚地方极端势力尤其是德尔纳的极端分子组建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功占领德尔纳和苏尔特,关键在于当地的极端势力主动投靠“伊斯兰国”组织,并借用其影响力进行扩张。但 2014 年以来,尤其是“伊斯兰青年协商委员会”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后,外籍武装人员开始大量涌入利比亚。有学者认为,相对于交战国本地的武装人员,极端组织内部的外籍武装人员往往具有更强的战斗欲望,以及更加激进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sup>①</sup>有报道指出,除本土极端分子外,“伊斯兰国”组织利比亚分支中有大量来自也门、沙特、伊拉克、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武装人员,但自杀式袭击等“高危”作战任务往往由非利比亚籍的极端分子执行。

最后,“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挑拨部落矛盾,通过各种手段汲取财富,巩固其对占领区域的控制。2015 年 2 月,苏尔特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曾经处死数十名埃及基督徒,4 月中旬再次处死数十名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事实上,利比亚并不存在类似伊拉克和叙利亚那般严重的教派冲突,“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分支无法利用当地的教派矛盾。<sup>②</sup>但“伊斯兰国”组织却转而发现利用利比亚的部落矛盾可资利用。2015 年下半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开始通过挑拨部落矛盾来实现扩张和巩固势力范围。该组织不断扰袭苏尔特西部尤其是米苏拉塔的武装人员,挑拨利比亚不同地区和部落之间的关系,借机赢得苏尔特地区卡达法(Qaddafi)、法尔加恩(Farjan)和瓦法拉(Warfalla)等部落的支持。2011 年卡扎菲政权倒台,这些部落一直受

<sup>①</sup> Bakke, Kristin M, “Help Wanted? The Mixed Record of Foreign Fighters in Domestic Insurgenc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4, 2014, pp. 150-187.

<sup>②</sup> Geoffrey Howard, “ISIS’ Next Prize, Will Libya Join the Terrorist Group’s Caliphate?”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libya/2015-03-01/isis-next-prize>, 登录时间: 2015 年 9 月 2 日。

到米苏拉塔地区武装团体的打压,因此试图依靠“伊斯兰国”组织以遏制米苏拉塔的武装势力。

在社会管理和征税方面,“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试图复制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发展模式。“伊斯兰国”组织占领德尔纳和苏尔特后,在当地建立了宗教法庭,以管理民政事务;推行极端教义,包括禁烟禁酒,强迫妇女佩戴面纱,禁止当地民众庆祝非伊斯兰教节日;在所在地区征收赋税,对拒不缴税的团体和个人予以威胁和处罚;勒令关停苏尔特大学等“非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控制区域的面积和人口数量较小,当地不少民众因不堪忍受极端的宗教法令而外逃,导致该组织在利比亚当地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这一现实令“伊斯兰国”组织往往通过灰色贸易和现金交易,使外部资金来源更加隐蔽;同时利用“哈瓦拉系统”<sup>①</sup>等非常规银行体系转移资金,通过巧立名目征税、绑架勒索赎金等渠道,实现资金运行内部化和资金来源多元化。“伊斯兰国”组织利比亚分支则往往通过非常规金融手段获取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资金支持,已成为叙利亚、伊拉克和北非地区金融联系的重要中转站。此外,“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通过举办慈善活动,试图巩固对占领区域的控制,实现占领的长期化,如该组织曾向的黎波里的贫困家庭发放粮食和衣物,向苏尔特城内的孩子发放糖果,以此拉拢当地民众。

### 三、“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扩张的制约因素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对北非地区和全球反恐提出了新的挑战。利比亚驻阿联酋大使阿里夫·阿里·纳伊德(Aref Ali Nayef)曾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将会严重威胁利比亚国家重建进程,进而危害整个北非地区和全球反恐形势。纳伊德表示,“利比亚已成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油气站、自动取款机和航空港”<sup>②</sup>。一方面,伴随“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该组织的极端分子在利比亚多地频繁发动针对外国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如2015年1月,该组织袭击了的黎波里的科林西亚(Corinthia)酒店,造成酒店内美国、法国、韩国和菲律宾等国人员伤亡;4月,该组织袭击了韩国和摩洛哥驻的黎波里大使馆;5月,“伊斯兰国”组织武装

<sup>①</sup> 哈瓦拉(Hawala)阿拉伯语原意为“转账”,是一种独立于银行系统的非传统、非正规的地下汇兑系统。关于哈瓦拉的详细论述,可参见Patrick M. Jost, “The Hawala Alternative Remittance Systems and Its Role in Money Laundering,”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terrorist-illicit-finance/Documents/FinCEN-Hawala-rpt.pdf>,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日。

<sup>②</sup> 转引自Kate Brannen and Keith Johnson, “The Islamic State of Libya Isn’t Much of a State,”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7, 2015,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2/17/the-islamic-state-of-libya-isnt-much-of-a-state>, 登录时间:2015年9月2日。

人员绑架了一对朝鲜夫妇。另一方面,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还时常保持同其他地区极端组织的联系。2015年初,“伊斯兰国”组织发布宣传视频,视频中两名图阿雷格武装人员使用图阿雷格语号召利比亚南部的图阿雷格人加入该极端组织,并号召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sup>①</sup>的民众主动与“伊斯兰国”组织取得联系。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还宣称要和西奈半岛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共同作战,表示“利比亚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我们要像德尔纳的兄弟们那样开辟新的阵线……最终同‘耶路撒冷支持者’<sup>②</sup>的兄弟们胜利会师”<sup>③</sup>。当前,利比亚已成为北非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中转站,也是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国境内极端组织重要的海外联络站。

当前“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和发展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一方面,部落文化对“伊斯兰国”组织推行极端教义构成巨大挑战。“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扩张期间,外籍极端人员因难以适应利比亚本土的部落文化与当地的极端分子产生了严重对立,直接导致“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受挫。利比亚的社会结构具有典型的部落特征,部落认同对利比亚政治和社会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英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定义,部落是指“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从事技术含量较低或者没有技术含量工作的民众结成的社会组织。部落大于家庭,但是又小于民族,由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和义务契约为纽带结合在一起”<sup>④</sup>。学者纳吉玛在其著作《部落文化与暴力》中归纳了“部落文化”的三大作用,即对家族和群体内部进行管理和约束,塑造身份认同和传承文化,在同其他群体的交往中保护部落成员安全并竞争生存资源。<sup>⑤</sup>

利比亚西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昔兰尼加和南部的费赞三大地区差异较大,当地部落众多,民众的部落意识、地区归属感强烈。利比亚约有 2 000 多个部落,其中规模较大的部落 50 个,中等规模的部落约 140 个,这些部落对利比亚国家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无论是伊德里斯王朝时期还是卡扎菲时期,利比亚的国家建构始终无法逾越部落差异这一现实。二战后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国家是集宗教、部落与家族、官僚于一体的综合体。在其统治的前半期和部分

① 萨赫勒是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向沙漠过渡地带的区域,跨越乍得、冈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家,参见李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及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第71页。

② “耶路撒冷支持者”(Ansar Beit al-Maqdis)组织是活跃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极端组织,2014年11月更名为“伊斯兰国”西奈省(Wilayat Sinai)。

③ Andrew Engle, “The Islamic State’s Expansion in Libya,” *The Policy Watch of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February 11, 2015,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other/POL2371-WithNotes.pdf> 登录时间:2015年6月19日。

④ Amal Kuper and Jessica Kuper, *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p. 699.

⑤ Najma Najam, *Tribal Culture and Violence*,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 p. 3.

后半期里,国家被保守的部落、家族和宗教人士所把持,“他们在利比亚独立之前就是有权有势者”<sup>①</sup>。在利比亚,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祖先凝结而成的家族和部落,以及伊斯兰传统始终是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和依据。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矛盾在于国家围绕权力和民族认同与传统社会组织(家族、部落和伊斯兰宗教势力)之间的博弈。卡扎菲在《绿皮书》集中阐述了部落的重要作用,提出“个人在人类大家庭中就像叶子生长在枝条上,枝条生长在树干上一样。如果枝条离开了树干,就失去了价值和物质生命。个人情况也是如此,一旦脱离了家庭,也就没有了价值,进而失去了社会生命”<sup>②</sup>。

“伊斯兰国”组织最初在利比亚拓展势力范围时,试图以超民族的宗教极端主义来重新塑造占领地区的秩序,忽视了利比亚本土的部落政治和文化。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利比亚分支中存在不少外籍武装人员,这些极端分子虽有助于“伊斯兰国”组织构建更加广泛的国际网络,但也为该组织带来了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即不同国家的武装人员往往因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而增加组织的管理成本,极端组织因成员国籍、民族和种族的差异而导致内部难以建立统一的文化认同。从“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扩张经验来看,外籍武装分子思想更趋激进,执行相关的宗教政策也更加坚定。<sup>③</sup>外籍极端分子倾向于利用激进手段在占领区建立推行“伊斯兰化”的组织机构。在利比亚德尔纳,来自也门和伊拉克的极端分子往往基于被曲解的宗教极端教义随意处罚市民,遭致民众的强烈不满。无论是在德尔纳还是在苏尔特,一些有名望的宗教领袖和部落领导人因反对“伊斯兰国”组织而遭到该组织斩首后,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抗。2015年2月至10月,苏尔特当地共发生了四次反抗“伊斯兰国”组织的民众武装起义。尽管“伊斯兰国”组织仍能够通过暴力手段控制危机,但却难逃当地民众的指责和抗议。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控制区的财富有限,难以支撑该组织在短时期内实现更大范围的扩张。对于任何一个极端组织而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崛起和扩张,需要具备人、财、物等资源。当前,“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主要受到资金和人员两方面的制约。在资金方面,“伊斯兰国”组织难以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样获得大量的石油收益,短时期内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遭遇现实困境。尽管利比亚境内油气资源丰富,但“伊斯兰国”组织尚不能有效利用,其原因主要包括:首先,利比亚的石油产量已大幅缩水。相对于2011年北约对卡扎菲军队发起军事打击之初,当前利比亚石油产量已减少四分之三,如今利比亚每天的石油开采仅40万

① [美]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 韩志斌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② 潘蓓英《列国志:利比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③ Scott Gates and Sukanya Podder, “Social Media, Recruitment, Allegiance and the Islamic Stat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ume 9, Issue 4, 2015, p. 116.

桶。其次,“伊斯兰国”组织难以将石油资源大量出口以换取收益。尽管“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了苏尔特周边的 10 余处油井,但该组织控制下的苏尔特港基础设施已遭毁坏,油品储存设施匮乏,只能实现小规模石油外运和石油交易。最后,“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控制区域仍面临反复动荡的局面,苏尔特地区的油气产品需要通过漫长的管道运送至港口以进行提炼和出口,因此“伊斯兰国”组织难以对石油产品进行有效控制。“伊斯兰国”组织对利比亚境内其无法有效控制的石油资源和石油管道采取了破坏政策,以此削弱和制衡利比亚其他武装团体的经济来源。

从“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发展轨迹来看,转型中的利比亚国家世俗和宗教势力对抗严重,地方势力尤其是部落力量坐大,经济衰败、民生恶化,加上外部势力的不断干扰和介入,以及美国“战略东移”和反恐战略收缩,使得“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得以肆意滋长。与“基地”组织在扩张过程中形成的“核心弱、分支强”<sup>①</sup>的特点相反,“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能够控制大片地域和人口等“核心要素”,而“伊斯兰国”组织的海外分支,尤其是利比亚分支的扩张则面临着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利比亚当地极端组织的挑战。

随着 2015 年以来国际社会和伊拉克、叙利亚国内各政治军事团体反恐合作的不断加强,“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控制区域已大幅缩减。除利比亚外,“伊斯兰国”组织已宣布在埃及建立“西奈半岛省”(Wilayat Sinai),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建立“呼罗珊省”(Wilayat Khorasan),在也门建立“也门省”(Wilayat Yemen),表明“伊斯兰国”组织正加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外地区的扩张。如同“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该组织在上述地区和国家的扩张,一方面给当地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其所秉持的宗教极端主义与当地部落和族群文化之间的矛盾反过来又制约了该组织自身的扩张。宗教极端主义既是“伊斯兰国”组织扩张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其扩张的制约因素。

(责任编辑:包澄章)

<sup>①</sup> 关于“基地”组织“核心弱、分支强”的分析,参见刘中民《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其根源》,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6 期,第 17 页。